

## 济南五峰山东魏佛教造像碑考释

周晓冀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五峰山东魏一百三十四人造像碑座自清代就被发现和著录,但至今研究甚少。该碑座题记所列像主、维那等职,反映了北朝时期泰山地区民间的邑义造像组织结构及其活动特点。根据其它地区同时代佛教石刻造像分析,该造像碑原佚造像的主要特征为舟形背上刻飞天拱卫宝塔的佛与菩萨造像组合。该碑座之僧图体现的是罗睺罗奉献释迦欢喜丸情节。

**关键词:**邑义;像主;维那;宝塔;三尊像;罗睺罗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735(2014)02-0058-07

五峰山东魏造像碑,又称东魏一百三十四人造像碑,仅余碑座。碑座系清道光年间出自济南五峰山仙人台,上有楷书题记和人名若干。该碑座为石灰岩质地,灰黑色,长方体。长八十六公分,宽七十二点五公分,高二十二点五公分。今存泰安岱庙历代碑亭,其上平整,叠覆北齐乾明元年造像碑座及隋代观音造像碑残件。

五峰山自古就是文化名山,其位于济南市区西南二十二公里处长清县境内,现存商周时期峙国遗址,出土过大量珍贵文物。汉晋以来,道家思想和佛教禅观在此山流行,更出现儒、释、道争艳相融的格局,儒家的讲书院、佛教的圣佛莲花洞、道教的三清殿相继建成。其莲花洞,当地人称“千佛洞”,窟内有一佛结跏趺坐,旁立二菩萨二弟子,四周洞壁及拱门两侧雕两百余尊小佛,造像年代从北朝晚期一直到隋唐。该窟外崖壁上有彩绘浅浮雕佛与菩萨像,部分像有龕。其中一龕为八躯像,七佛为跏趺坐、一佛半跏趺坐。大部分造像毁损严重,但能够辨识的部分服饰线

条优美、色彩艳丽。尤其是菩萨像项饰珍珠,姿态婀娜,手足等细部特征形象逼真。在四佛一龕像旁边写意浮雕小塔,造型上同柳埠北魏四门塔外形十分相似。龕像之左有大量东魏至北宋佛教造像题记。据清嘉庆《山左金石志》载:

“(隋)莲花洞造像题字三十种,在洞外东壁者五种,在洞内北壁者二十三种,在洞内南壁者二种,每种五六字至二十余字不等,向未著录,此段赤亭亲至五峰搜得之。”

如今不少题记尚存,但多数已漫漶不可识。该地还出土不少有代表性的佛教造像碑,其中影响较大的即是东魏武定五年一百三十四人造像碑。

该碑在《长清县志》卷末《五峰志略·金石》中有记载:

“钓鱼台东仙人台人。清道光二十三年,土人掘地得铜鼎一、炉一、烛台二。光绪十六年,又掘得石块一,已残缺。石刻佛像一,似束发,以帛为冠。左手执一物,似珠下垂将宝盆中。其盆下有倒垂莲,以右手承其柄,屈一膝跪一物上。

收稿日期:2013-11-29

作者简介:周晓冀(1971—),男,江苏宜兴人,泰山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助理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

旁一瓶更有一物，不能辨。题云命过王元吉。”

文后录有题记，不甚精确，末言：

“此石现在黑峪程鹏翥家，拟置之隆寿宫。又土人于台上又掘得石佛一尊，高二寸许，石黯黄色，雕琢精工，在孙占魁家。”

隆寿宫即五峰山道教北观，也就是洞真观，在明代被敕封为“护国隆寿宫”。该碑 1966 年被发现于长清县黑峪村百余年来未出其出土之地。

该碑三面刻有造像题记，笔者亲录如下。

正面：

“大魏武定五年岁次丁卯七月丙申朔四月乙亥，邑仪一百三十四人等敬造石像一躯，上为国祚口隆，该类七世父母、居家眷属、一切堪仪，咸同斯福。

钟盖世 像主王盖周 钟道明 菩萨主钟令 王惠兴 菩萨主钟助 李弥陀 起像主王念 邹文愷 光明主僧休 王贵 宝塔主马庆林”

以下为都维那、维那数人。

右侧面：有一幅僧图，旁刻“命过王元吉”，以下并列比丘数人，及维那开记、僧转、王僧辩等人。

左侧面：大部分损毁，仅余钟姓人名两处。

#### 一、题记中所见造像主及造像题材的推定

“大魏武定五年”为东魏孝静帝年号，即公元 547 年。题记仅云，所造佛像为“石像一躯”，但现在石像已佚，唯余石碑碑座一通，所以判断佛像的神格较为困难。由于碑座的体量较大，又有多人参与，可以明确地认为上文《长清县志》中提到的二寸小佛像，并非发愿文中所云石像。中古时期的造像发愿文中往往并不提及所造佛像的神格，只是笼统地说造像一躯或石像、白玉像、玉像一躯等等，或者干脆只说敬造、供养等言。一躯也并非只是一尊，而有可能是佛与菩萨或弟子的组合形式。贺世哲先生在《敦煌图像研究》中就列出 50 余例发愿文，并且说到对于大多数下层佛教徒，造佛像的目的仅仅为了祈福灭灾，来世得生佛国，“至于在什么地方造什么像来保佑，他们既分不清，也无心深究，只是盲目的效法，这也就难免糊里糊涂。”<sup>[1](135-139)</sup>

因此要推论究竟造的是什么佛，需要根据现

有图文线索综合考虑。发愿文中涉及多种造像主，或可大体判断造像的组合情形。

碑文中提到“像主”、“起像主”、“菩萨主”、“光明主”、“宝塔主”及“都维那”、“维那”数人等，可知这是一建制完备、功能齐全的造像邑义组织。清代王昶在《北朝造像诸碑总论》中总结造像组织中有十六种职务，其中就包括“都像主”“光明主”等<sup>[2]</sup>

现存中古时期的佛教造像碑，大多都明确记载有邑义或社邑组织参与造像的题记或铭刻。北魏时期邑义组织开始出现在中原地区，是一种以族村为地源的民间佛教组织，到隋唐时期逐渐流行于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这种专门的民间佛教组织，一开始从事造像、写经、行香等活动，后来逐渐发展，兼及于修建寺院、石窟等。其组成有明确的职务、职位，分担不同工作，故又称为佛社。首领称为邑义主、法义主或邑长等，成员称为邑义、法义、邑子、邑人、邑徒等。佛社还长期聘有当地名僧作为邑师，指导日常的佛教活动。<sup>[3]</sup>

根据以往所见的造像碑记资料及王昶《北朝造像诸碑总论》，我们可以列出一般佛教造像组织的设置分工情况（见下表），其中有些正是东魏一百三十四造像碑中所提到的邑义职务。

像主或菩萨主，以及各种其他各类造像题材的造像主，是邑义组织中最为常见的职务，也反映了邑义组织最为普遍的职能。有许多题记虽未明确写出像主所造佛像，但依题记内容仍可判断其为何种造像的像主。有些造像比较特殊，或为了引人瞩目，也采取特别的题名，如“十六王子像主”、“白衣大像主”等。东魏一百三十四人造像碑中明确提到的像主有十人，其中“王盖周、钟道明”称为“像主”，估计这是造像的主要发起人或出资者。另有“菩萨主钟令、王惠兴、钟助、李弥陀”四人，当为胁侍菩萨的出资檀越。由于前面有像主一职，此处单独说明另有菩萨主的职务，说明此造像有可能为一佛二菩萨三尊像，如有弟子，则为五尊像。至于主尊像则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可能是释迦牟尼，也有可能是弥勒或阿弥陀佛等。后面又出现“宝塔主”二人：“

中古时期邑义造像组织结构表

邑义造像组织			
功德		造像、刻经、写经、建寺、建塔、造桥、其它	
功德主	职务	职事	都像主、副像主、东西南北四面像主、邑师、邑主、邑老、邑正、都邑主、邑中正、唯那、都唯那、典录、典坐、维那、维那主、菩萨主、光明主、都开光明主、开经主
		施主	都大檀越主、檀越主、像斋主、左右稍斋主

马庆林”，宝塔形与三尊像、五尊像的搭配，是典型的佛教造像题材，在南北朝晚期十分流行。类似的例子很多：

藏于岱庙的东平北齐三尊像，舟形大背光顶端有一小塔，塔刹由三重相轮组成，左右各六身飞天，皆浮雕于背光上。

北齐天宝三年（552）赵弥山等造五尊像，舟形背光顶端宝塔，以莲花相托，上层塔檐叠涩挑出，左右各有三身飞天供养，形态极似东平三尊像之飞天。<sup>[4](109)</sup>

北齐思维菩萨三尊像，出处不详，背光上端有一兽面承托宝塔，塔下有覆莲，以三根塔柱支撑塔顶。<sup>[4](110)</sup>

“此类造像，较早见于北魏东迁以后的造像碑，如北魏正始四年（507）弥勒三尊像（藏于保利艺术馆），碑上部二飞天双手托塔，其下四伎乐飞天左右环绕。北朝后期常见于青州系造像。青州龙兴寺出土的造像碑，由北魏晚期至北齐形成系列，背屏顶部多为飞天托塔，塔为覆钵式，常以嘉莲雕饰，疑受邺下造像影响。”<sup>[5](14)</sup>然而北魏永熙以前的背屏式三尊像，背光顶部多刻翔龙，显示了极强的青州风格。如出土于青州西王孔庄，今藏山东省博物馆的张宝珠造像、青州市博物馆太昌元年惠照造像以及永熙二年三尊像。自东魏伊始，背屏上端才多现宝塔，至北齐，宝塔成为背屏式造像的典型特征之一。

青州市博物馆藏此类东魏造像还有：

东魏贴金彩绘三尊像多通，背光上部八身伎乐飞天拱卫一方塔，塔有敷钵，上有一或三刹。<sup>[5]</sup><sup>(60-81)</sup>另有残件多个，形式类似。<sup>[5](100-105)</sup>

东魏天平三年（536）邢长振造释迦三尊像，背

光上部有六身伎乐飞天其中二飞天背负方塔。<sup>[5](70-71)</sup>

还有一件彩绘石雕三尊像，背光上部的飞天及宝塔都以阴线刻出，十分华丽繁缛。<sup>[5](86)</sup>

据以上分析比对，可以猜测，受到青州系造像的影响，五峰山东魏武定一百三十四人造像的基本形式可能为菩萨胁侍佛组合，而且是雕有伎乐飞天拱卫宝塔的背屏式造像。背屏式石雕佛像从北朝到隋代都十分流行，主题造像刻在舟形背屏之上。背屏下端多用隼结构插入基座，基座不但是固定造像的基石，而且通常刻有像主姓名和发愿文等题记。岱庙所藏这块造像碑残部当为背屏式菩萨侍佛造像的基座。

## 二、题记中其他邑义职事的功能

东魏武定五年一百三十四人造像题记中出现“光明主僧休、王贵”等人姓名。光明主是比较正规的造像组织中常设职事，又被称为开佛光明主、开光明主、开弥勒像主等。其职能是造像雕饰毕备后，出资延庆僧人做法事，为造像开光。旨在赋予石像以生命与灵性，由此宣告造像正式完成，可以交付供养、膜拜了。在北魏时期的造像中，类似的例子很多。如北魏正光年间的比丘法亮、法海造像，其正面雕一佛二菩萨像，舟形背光后面有交脚菩萨、半跏思惟菩萨、维摩文殊像等精美浮雕，下部题记刻有“开佛光明主”、“光明主”。刘淑芬认为，“光明主”或“开光明主”是给予主持、负责开光仪典的僧人的称呼。<sup>[5]</sup><sup>(497-544)</sup>但一百三十四人造像碑上分明列有“光明主王贵”字样，说明担当光明主的未必不能是俗人，也许王贵正是出资延请僧人做法开光的檀越。东魏兴和四年（542）李氏合邑造像碑题记中有“开二佛光明主”、“开佛光明主”、“光明主”等

职事，颜尚文也认为，“他们可能是在李氏合邑居民建造释迦佛像、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各种菩萨像之后，担任礼请僧侣为佛像开光的角色，而显现李氏合邑共同体进行各种佛菩萨像开光的仪式活动。”<sup>[6](233-247)</sup>

一百三十四人造像题记中提到的“光明主僧休”，很可能同时是该邑义组织的邑师。“僧休”一名见于《续高僧传》。其《义褒传》中载“僧休通精于大论”。僧休为道宠门人，而道宠又是菩提流支嫡传弟子。僧休是其高足之一，僧休同门有志念、法继、诞礼、牢宜、儒果等人，而更与慧远等人并称五大德。<sup>[7](482)</sup>道宠、僧休等人是地论宗北道系代表，以弘扬《十地经论》为主。

此处题记中的“僧休”是否是佛教史上五大德之一呢？据《宝装传》记载，“释宝装，贝州人。雍州三藏僧休法师之弟子，休聪达明解神理超逸，齐末驰声广于东土。”说明 577 年之前，僧休已经大名鼎鼎。僧休早年就学于道宠，同时听过道宠讲经的还有高齐元魏之际著名文学家魏收。“时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杨休之等，昔经宠席，官学由成。”魏收在东魏，官至秘书监，兼著作郎，定州大中正。入北齐后，任中书令，兼著作郎。《北齐书》又云：“自武定二年（544）已后，国家大事诏命，军国文词，皆收所作。”<sup>[8]</sup>这时的魏收堪称文雄。可以推断，武定年间，僧休有可能正在道宠门下。同学静影寺慧远，生于 523 年，开皇七年（587），敕为大师，与僧休同在彭城听昙迁开讲《摄大乘论》。“时洛阳慧远、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济阴宝镇、汲郡洪遵，各奉明诏同集帝辇。迁乃率其门人，行途所资皆出天府，与五大德谒帝于大兴殿。”<sup>[9](571)</sup>清河郡今河北清河、山东临清一带，离五峰山不算太远。又《续高僧传》灵干传记载，开皇十七年（597），灵干死后于兜率天得见慧远与僧休事。“开皇七年，……为译经证义沙门。至十七年遇疾闷绝，惟心不冷未敢藏殓。后醒述云，……到一大园，七宝树林端严如画，……忽闻人唤云：灵干汝来此耶。寻声就之，乃慧远法师也。礼讯问曰：此为何所？答是兜率陀天，吾与僧休同生于此。”<sup>[10](518)</sup>僧休当

与慧远年龄相仿。也就是说武定五年僧休当值年壮，或从清河往洛阳学于道宠，有可能途径五峰山一带担任邑义组织的光明主，从事写经造像。当然这只是揣测，还没有确凿的直接证据证明。

起像主在题记中有二人：“王念、邹文禧”。“起像主亦见于东魏李氏合邑造像碑左侧。”<sup>[11](313-324)</sup>

“起像”的意思大概是承担对石像运输的功能。一般的邑义组织成员只要担负起运费或能够组织劳动力将佛像运至指定场所，都可以成为起像主。在有些造像碑中有“行像主”一职，或许职能类似。

北朝造像的邑义组织，还常常援引佛教团体的僧职，形成自己管理机构。这些组织常常会以僧官或寺职的名称作为其主事人的称谓。像寺院三纲之中“寺主”、“维那”等，就经常出现于邑义造像题记之中。如东魏李氏合邑造像碑中称为“都唯那”者有十六人，“大都唯那”二人，“唯那”三十四人。《山左金石志》中亦载：兴山摩崖有北齐武平六年韦子深等题记，名前冠以“督口那”，当是“都维那”；北周铁山摩崖残字中有“搜扬好人平越将军周任城郡主簿大都维那间长嵩等字”；开皇六年仲思那造像碑，刻有冠名“维那”的像主三十六人。<sup>[12]</sup>

“都维那”或“维那”或“唯那”，来源于北魏僧官制度，是沙门统的副长官。职责是辅助沙门统管理僧徒名籍、印牒等，并执掌戒律的执行和检查。受僧官唯那的影响，作为佛教邑义组织的唯那，也常是副首领。东魏一百三十四人造像碑碑阳题记中，有都维那“王承祖、王怀、钟文渊”等六人，维那“王思贤、钟方”等十七人，这些人当是一百三十四人造像组织的领导阶层。

一百三十四人造像题记中众像主和维那以王姓和钟姓为主。其中发愿文下，像主题名之上单独一行书“钟盖世”。碑右面僧图旁刻有“命过王元吉”，随后书一行比丘名，而在行下独刻一名“王僧辩”，亦十分特别。《梁书》中有《王僧辩列传》。王僧辩，南朝梁大臣，字君才，本姓乌丸氏。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鲜卑族。任梁湘东王萧绎的左常侍，为萧绎平侯景之乱，败河东王萧誉。萧绎公元 547 年任荆州刺史，王

僧辩随之镇守江陵。承圣四年(555),迎立北齐扶植的萧渊明为帝,遭陈霸先反对所杀。武定五年,王僧辩正在湖北,<sup>[13](623-635)</sup>题记中的维那或仅仅与之重名。若是此人,应该在名前冠以官衔,这是一般造像发愿文的惯例。《长清县志》中还提到,在五峰山莲花洞石窟内众多造像题记中有大像主“钟崔”之名。或许东魏之时,五峰山一带“钟、王”二姓是崇佛的大族。

北朝的佛社多以一村一镇,或一都邑内的民间佛教信徒为主,和附近寺院的僧尼自愿结成刻经或造像团体,成为佛教文化中国本土化的重要力量。东魏一百三十四人造像碑中民间信徒勒名于碑阳,说明这一时期民间佛社形式已经十分完备,参与人数众多,造像规模更为庞大,组织更为严密。而右面刻有比丘十四人,加上担任维那等职的僧人计十八、九人,占题记刻名像主的37%左右。显示了佛社与寺庙的联系更为紧密、合作更为频繁。许多外地僧尼参与佛社造像,带来了先进的佛教文化,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其它地区的佛教交流,甚至导致了佛教思想在北朝末年的许多重大转变。



图一 东魏一百三十四人造像记僧图 (范霞绘)

七岁身,持欢喜丸径至佛前,奉进世尊。”<sup>[15](182)</sup>

贺先生认为这幅壁画与欢喜丸有关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同在428窟的一角仙人肩骑淫女扇陀壁画情节同样出自《大智度论》卷十七。在该故事中,扇陀以欢喜丸诱惑一角仙人,释迦最

### 三、僧图的经典依据

关于僧图形象笔者一直困惑不解,其装束似是而非,既不像菩萨又不像比丘,而且其手持器皿及宝珠形物,似有缘由(见图一)。

近日捧读贺世哲先生大作《敦煌石窟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在《法身观·本生图》一章发现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壁画中竟然有相似图像,颇受启发。

敦煌莫高窟428窟建于北周,在东壁窟门北侧于一角仙人(又称独角仙人)本生图右侧画一佛,现说法相。佛前胡跪一人,头戴“山”字形冠,一手举杯,一手似向杯中投物,情形与碑中僧图极为相似(见图二)。据李永宁先生和贺世哲先生考证,这是表现“耶输陀罗遣七岁儿子罗睺罗送欢喜丸给释迦。”<sup>[14](202)</sup>

该图像的经文依据来源于《大智度论》卷十七:“复次,如罗睺罗母本生经中说:释迦文菩萨有二夫人:一名瞿毗耶,二名耶输陀罗。耶输陀罗,罗睺罗母也。是时耶输陀罗,持一钵百味欢喜丸,与罗睺罗,令持上佛。是时佛神力以变五百阿罗汉,令如佛身,无有别异。罗睺罗以



图二 敦煌莫高窟第428窟东壁 北周 (选自《谢成水敦煌壁画线描集》图43)

后告诸比丘:“一角仙人,我身是也;淫女者,耶输陀罗是。尔时以欢喜丸惑我,我未断结,为之所惑;今复欲以药欢喜丸惑我,不可得也!”<sup>[15](183)</sup>同卷又有耶输陀罗以百味欢喜丸阻止佛修行而失败,表现了释迦坚定的修行意志和无量佛力。“佛

力无量，神心难测，不可思议！耶输陀罗药欢喜丸，其力甚大，而世尊食之，身心无异。”<sup>[15][183]</sup>

欢喜丸（梵语 mahotika<sup>^</sup>）又作欢喜团，系古代印度人食物之一。指以酥、面、蜜、姜等调和制成之食物。《大般涅槃经》卷三十九云，“酥、面、蜜、姜、胡椒、荜茇、蒲萄、胡桃、石榴、椶子，如是和合，名欢喜丸。”<sup>[16][595]</sup>又，《十诵律》卷三十一中，曾举出胡麻欢喜丸、石蜜欢喜丸、蜜欢喜丸等。欢喜丸也是北朝禅观中之不净观的典型对象。在《大智度论》卷十七，接连讲了三个与欢喜丸有关的故事：罗睺罗进奉释迦欢喜丸、耶输陀罗试图用欢喜丸挽回释迦之心、淫女扇陀以欢喜丸迷惑一角仙人。三个故事依次展开，内在联系十分紧密。在故事中无一例外突出了欢喜丸的种种强烈的诱惑力，但一一为释迦所破解。在这三个故事之前，经文也有所铺垫，即讲述了五百仙人闻雪山浴女歌声失禅定、沙弥贪爱食酪死后变虫、月分王子食毒果而亡等故事，阐明“观身不净三十六种则生厌心，若于触中生着虽知不净，贪其细软观不净无所益，是故难离。”<sup>[17][182]</sup>

从图像上看，东魏一百三十四人造像碑中线描僧图与 428 窟罗睺罗进奉释迦欢喜丸的姿势几乎一模一样。特别是装束绝非袈裟，而且头冠同样奇特。

七岁之身的罗睺罗戴何种头冠不得而知，但刚出生的罗睺罗就与众不同，《佛本行经集》云：“其罗睺罗，可喜端正，诸人见者莫不欢悦。肤体黄白，如真金色，然其头顶，犹如伞盖。……诸根完具，莫不充备。”<sup>[18][889]</sup>

伞盖即伞状幡幢，王室出行必备的仪仗之物，在经中多作为宝物供奉释迦和诸僧。摩诃僧祇律亦云其为僧人随物之一，“锡杖、革屣、伞盖、扇、及余种种所应畜物，是名随物。”<sup>[19][245]</sup>在密教菩萨现相中，有其夸张形式，“复次以二手如蛇头形，安顶上如伞盖势，微现忿怒相，此是穰虞梨菩萨印能除一切毒。”<sup>[20][575]</sup>总而言之，罗睺罗头冠形式的确十分特殊。不论是敦煌莫高窟 428 窟罗睺罗的山字形冠，还是东魏一百三十四人造像碑中冠羽三分，两者十分形似，都显现造像本体似乎

具有某种特殊的身份。

关于罗睺罗认父归依佛法事，见于多种经典。其中《普耀经》是较早版本，诸经多从其引用。如僧佑撰《释迦谱》：

“普耀经云：佛还入宫坐于殿上，俱夷携罗云来，稽首佛足，瞻对问讯。时王僚属皆怀沈疑，太子捐国十有二年，何从生子？佛语父王告诸群僚，俱夷守节贞洁、清无瑕疵，设王不信今当现证。于时世尊化诸众僧，皆使如佛。罗云年始七岁。俱夷即以指印信环，与罗睺言：是汝父者以此与焉。罗云应时直前诣佛，以印信环而授世尊。王及群臣咸皆欣踊，称言：善哉！真佛子也。佛语父王及诸臣曰：从今已后无复怀疑，此吾之子，缘吾化生，勿咎俱夷。”<sup>[21][62]</sup>俱夷即罗睺罗母耶输陀罗。

《佛祖统纪》云：

“耶输夫人携子罗睺罗来诣问讯（时年六岁），时王僚属咸疑。太子去国十有二年，何从生子？佛告群僚曰：耶输守节无瑕，今当见证。于是世尊悉化众僧皆使如佛。耶输即以与罗睺言：是汝父者以此与之。罗睺应时直以印环而授世尊。王及群臣，皆言：善哉！真佛子也。”<sup>[22][155]</sup>

《罗睺罗母本生经》、《佛本行集经》也有类似记载。出自《普耀经》的说法，罗睺罗是手持“指印信环”与释迦相认的。从东魏一百三十四人造像碑阴线僧图看，人物所执圆形物，似乎也可以认为是“指印信环”。另外敦煌莫高窟 428 窟东壁壁画罗睺罗身后有一低首抬蹄的马，似乎刚刚急奔而来，身上的马鞍还没有褪去，正要休憩。正好表达了罗睺罗骑马赶来，急切与释迦相认的一幕。

在随后的故事中还有释迦命舍利弗度罗睺罗，受沙弥戒事。事见《四分律》：

“罗睺罗母与罗睺罗，在高阁上见佛来。语罗睺罗言：彼来者是汝父。尔时罗睺罗，疾疾下楼至如来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时世尊以手摩罗睺罗头。罗睺罗自念，从生已来未曾得如是细滑柔软乐。佛问言：汝能出家学道不？答言：我能出家。尔时佛舒一指与罗睺罗捉，将至僧伽蓝

中。告舍利弗言：汝度此罗睺罗童子。”<sup>[23][809]</sup>

总之，经中的这一对父子相认的情节，非但不是表现普通的人情世故，而且更重要地是为了现示佛教的无量法力。佛教的强大吸引力早已突破了世俗之情。不论是莫高窟 428 窟东壁画，还是东魏一百三十四人造像碑，都是通过图像展现的故事情节，表达了北朝末年，世俗佛教信徒自认佛子，皈依佛法的迫切心情。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东魏一百三十四人造像的题材就应该是，以释迦牟尼为主尊的三尊像或五尊像了。当然这也是推测。东魏一百三十四人造像碑留给我们的信息实在太少，这样的推测是否合理，还需请教方家。

参考文献：

- [1] 贺世哲. 敦煌图像研究 [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
- [2] 王昶. 金石萃编卷 39, 北魏造像诸碑总论. 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 隋唐五代石刻文献全编 [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 [3] 卜秋香. 唐宋时期的邑社 [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3).
- [4] 李静杰. 石佛选粹 [M]. 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
- [5] 刘淑芬. 五至六世纪华北乡村的佛教信仰 [J].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3，(7).
- [6] 颜尚文. 法华思想与佛教小区共同体——以东魏《李氏合邑造像碑》为例 [J]. 中华佛学学报，1996，(10).
- [7] 《续高僧传》卷 7《魏邺下沙门释道宠传》，《大正藏》第 50 册.
- [8] 《北齐书》卷 37, 列传第二十九魏收.
- [9] 《续高僧传》卷 17《隋西京禅定道场释昙迁传》，《大正藏》第 50 册.
- [10] 《续高僧传》卷 12《隋西京大禅定道场释灵干传》，《大正藏》第 50 册.
- [11] 北京鲁迅博物馆 上海鲁迅纪念馆《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 年，第二函第二册.
- [12] 毕沅.《山左金石志》卷 20, 清嘉庆二年刻二十四卷本.
- [13] 《梁书》卷 45《王僧辩传》，中华书局，1973.
- [14] 贺世哲. 敦煌图像研究 [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
- [15] 《大智度论》卷 17,《大正藏》第 25 册.
- [16] 《大般涅槃经》卷 39,《大正藏》第 12 册.
- [17] 《大智度论》卷 17,《大正藏》第 25 册.
- [18] 《佛本行集经》卷 51,《大正藏》第 3 册.
- [19] 《摩诃僧祇律》卷 3,《大正藏》第 22 册.
- [20] 《佛说瑜伽大教王经》卷 4,《大正藏》第 18 册.
- [21] 《释迦谱》卷 2,《大正藏》第 50 册.
- [22] 《佛祖统纪》卷 3,《大正藏》第 49 册.
- [23] 《四分律》卷 34,《大正藏》第 22 册.

## A Research on Eastern Wei Dynasty Statuary Tablet Found in the Wufeng Mountain in Jinan City

Zhou Xiaoji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College ,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Eastern Wei Dynasty statuary tablet was found and recorded in Qing Dynasty, but it has been little researched. The names on it are listed as owners of the monument and Weina, which reflects the civil statues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activities in the Taishan area at that time. Like other stone carvings in the same period, the original statues with the nautiform backlight is the Buddha and Bodhisattva statuary combination circled by gandlmva and Buddhist pagoda. The character of Buddhist drawing is R hula.

Key words: Yiyi; Sponsors; Weina; Pagoda; Statuary combination; R hula

(责任编辑：许海丽)